

第二届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研讨”

论文集

编 委

香港浸会大学 余 振 邓树雄 周全浩 邵一鸣
清华 大 学 张慕津 林 泰 胡天赐 樊富珉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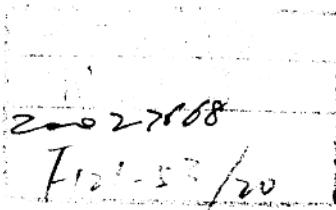
第二届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研讨会”

论文集

编 委

香港浸会大学 余 振 邓树雄
周全浩 邵一鸣
清华 大学 张慕萍 林 泰
胡天赐 樊富珉



Z0027668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论文集是第二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的理论成果。本论文集紧紧围绕当代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主题，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当代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取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而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解决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本论文集是与会代表最近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书 名：第二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作 者：香港浸会大学 清华大学 编委会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校内，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2 字 数：519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1 月 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3288-2/F · 229
印 数：001~630
定 价：46.00 元

前　　言

本论文集是第二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的理论成果。此次研讨会由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研究课程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伟伦学术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于1998年5月11日至1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与会正式代表共40余人，其中特邀代表2人，香港浸会大学代表17人，清华大学代表15人，北京大学代表1人，中山大学代表3人，香港城市大学1人，南京经济学院代表1人。两校领导对此次研讨会很重视，香港浸会大学为本次研讨会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曾宪博教授致开幕词，专程到香港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胡显章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词。特邀代表、国务院发展中心吴敬琏教授和人民大学李强教授作主题讲演，分别对国有企业改革及贫富差距现象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代表们在小组会上宣讲了自己的论文，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经过为期两天的讨论，取得很好的效果，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现将部分论文汇编，公开出版。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许多新的经验要总结；同时，中国很多重大改革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探索。本论文集紧紧围绕当代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当代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取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而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解决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本论文集是与会代表最近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在闭幕式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办得很成功，促进了京港两地的学术交流。香港浸会大学代表与清华大学代表商定，两校将于2000年5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办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仍然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两地学者认为，21世纪对中国来说，充满机遇和挑战，中国应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极为重要。学者们表示要进一步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拿出最新成果，迎接第三次研讨会的召开。

论文集的出版得到香港浸会大学的赞助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论文集中难免疏漏、错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编委会

1998.12

目 录

第二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开幕词

..... 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 曾宪博教授 1

在第二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 清华大学副校长 胡显章教授 5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改组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敬琏教授 7

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 李强教授 14

产权制度、风险机制与经理者阶层 北京大学 孙祁祥教授 18

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的探索 清华大学 胡天赐教授 24

富饶的贫困——提高人口素质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清华大学 张慕潭教授 28

半时就业制初议——一种扩大就业岗位, 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

..... 清华大学 林泰教授 33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与扶贫机制探讨——以广东为例 中山大学 刘琦教授 37

外资利用与广东经济发展 中山大学 陈广汉教授 43

发展资本市场 促进国企改革 清华大学 李刚军副教授 50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培育国有企业改革主体 清华大学 孔祥云副教授 59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a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Dr. Yang H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5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研究 中山大学 阎小培教授 77

分化与整合——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清华大学 艾四林副教授 86

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国情的新的文明观

..... 清华大学 赵甲明副教授 93

The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Its Causes

..... Dr. Zang Xiaohe HKBU 99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香港及内地对应之道 香港浸会大学 曾澍基教授 116

外资投资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及技术进步的贡献: 综合省市的实证研究

..... 香港浸会大学 洪云星博士 127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lo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in

Meixi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Mr. Ku Hok-Ban HKBU 138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Dr. Pun Nga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68

“东中西”——中国地区差距的内涵透视及趋势预测 清华大学 程建国副教授 195

中国的省份差异与经济发展		
.....	香港浸会大学 陈庆年博士 李崇高博士 李树甘	219
中国县际收入差距分析 香港浸会大学 郑毓盛博士	227
中国教育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及对策 清华大学 叶富貴讲师	240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 Dr. Chow Chun SHing HKBU	251
张之洞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开放、改革、承继与融和		
..... 香港浸会大学 叶国洪博士	257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清华大学 孟庆国 徐玉高 侯世昌教授	269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		
..... 清华大学 吴娅茹副教授	275
改革开放廿年——回顾与前瞻 香港浸会大学 徐泽民博士	282
China's Windows to the West for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Dr. Robert J. Taormina HKBU	299
广州市商品房住户对居室及居住小区满意程度调查结果评析		
..... 香港浸会大学 黄观贵博士 萧慧媚小姐	309
社会转型期下岗职工群体心态分析与调适 清华大学 樊富珉教授	321
九十年代中国城市青年生活价值观现状及趋势 清华大学 刘书林教授	332
中国大学生的政治与人生价值取向 清华大学 刘庆龙 张存库	337

第二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 会发展研讨会》开幕词

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 曾宪博教授

胡显章副校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清华大学与浸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今天在这里召开了，我代表浸会大学，预祝今次研讨会圆满成功，并对所有参与研讨会的嘉宾、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清华大学与浸会大学曾于 1996 年 6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北京共同主办第一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办得很成功，与会代表宣读了 27 篇有相当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去年顺利地出版了论文集。今次会议将宣读 40 篇论文，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相信有了第一届成功举办的经验，这一届的研讨会一定会办得更成功、更圆满。

自从 1978 年采取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和质素明显改善，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改变。但应该指出，经济和社会的急速发展亦同时产生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济规模跟不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社会上的贫富差距现象日趋严重。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先生及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作主题演讲，分别对国有企业改革及贫富差距现象作精辟的分析。

19 世纪中叶，中国被逼对外开放，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经过洋务自强运动、戊戌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和近 20 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经一个半世纪的不断探索和奋斗，虽然受到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我国人民从来没有气馁，再接再厉，朝着“开启民

智、富国富民”的目标不断努力。今年3月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再次肯定“科教兴国”的长远战略宏图。21世纪对中国来说，充满机遇和挑战，未来的几年极为关键。在这种新时期新形势下，香港学者有机会与内地专家学者一齐研讨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最后，祝愿清华大学和浸会大学之间的合作与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预祝此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1998年5月11日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pening Address)

Prof. Herbert Tsang, Vice-President, HKBU

Colleagu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happy to declare the opening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jointly organiz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Baptist University. On behalf of the Baptist University, I extend my warmest welcome to you all and wish the very best success of the conference.

On June 12 and 13, 1996,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so jointly organized by Tsinghua and the Baptis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 total of 27 high quality papers were presented at the first conference, which were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y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two-day conference following this opening ceremony, a total of 40 papers will be presented. Participants of the conference will explore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various aspect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from a multidiscipline perspective. I believe, based on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this conference will be equally successful.

Since the adoption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in the late 1970s,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Chinese masses in the mainland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But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lso brought along many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among others, (1)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cale of many state-owned-enterprises are no longer competitive in a market economy; and (2) the income disparity among the region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widening. Today 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two distinguished keynote speakers, Mr. Wu Jin-lian from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nd Professor Li Qiang from the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to address the

above two issues respectivel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was forced to open its doors to the West. Many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inally recognized that a huge gap exist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urged their governme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Since then, China has mounted numerous efforts to modernize the country in the "Chinese way". Despite all the ups and downs in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for over 150 years, China has pressed on and made small, but steady, progress. Great strid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hort span of 20 years since China adopted the open-door policy in 1978. In the Ni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eld in March this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to Construct China" (*kejiaoxingguo*). It is therefore very timely to hold an academic conference to address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confronting China's century-old efforts to seek wealth and prosperit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colleague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Baptist University on the very fruitful collaboration and friendship.

My best wishes to the very success of this important conference on China!

May 11, 1998.

在第二届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致词

清华大学副校长 胡显章教授

尊敬的曾宪博副校长

尊敬的各位学者、来宾：

首先感谢浸会大学的邀请，使我能有机会出席这个研讨会。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之一——清华大学对各位专家学者来参加这一研讨会表示诚挚的欢迎！对东道主浸会大学为筹办此次会议所做的组织工作和提供良好的条件表示感谢！

清华大学和浸会大学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近几年来，在谢志伟校长等校领导的直接关心下，两校的合作有长足的发展。浸会大学在我校教师访问、学生调研培养等方面，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支持。去年谢志伟校长还欣然受聘清华大学顾问教授，表明两校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自1996年6月两校在清华大学联合举办首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以来，两校学术研究合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在浸会大学召开第二届研讨会便是一个生动的证明。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许多新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同时，我国一系列重大改革正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深入探索。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高等院校对此应当有更多的贡献。正如江泽民主席最近所说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我们的研讨会正是紧紧围绕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展开的，相信我们研究的成果将在人才培养和知识贡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清华大学的同仁们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没有完全适用的结论可以遵循。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必须遵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倡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我们将努力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认真听取各种观点，并努力从中汲取有益的养份；同时，我们也将抱着务实求真的态度，发表自己看法。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学术研讨会议一定能比上一次开得更好、更有收获。

最后祝愿清华大学和浸会大学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1998年5月11日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改组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敬琏教授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很复杂。我1954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然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那时候党召开八大，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问题，到现在已经过了40多年了，还在谈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复杂。这种改革牵涉的问题太多了。我今天只想讲一讲有关的五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的概况

改革以前，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着支配地位。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是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国有经济，一种是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占支配地位、主导地位。按照苏联的理论，集体经济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因为它受到国有经济的领导。实际上在改革以前，中国的集体经济的主要领导人员，都是国家雇员，所以，集体经济也被看成是第二等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叫二轻，商业叫二商（第二商业）。改革以后，国有经济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1978年时，国有经济的比重是78%，90年代以后，就下降到了30%以下。国有经济的比重现在比较集体企业，甚至比乡镇企业还要低，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它所支配的资源，不管是自然资源、资本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占的比重都很大。从自然资源来说，城市土地、矿产资源都是国家所有的，从资本资源上看，资本资源现在主要采取信贷的形式，信贷资源的70%到80%是国有经济占有的。人力资源，从人数上看，国有经济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是，经过训练、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主要都在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虽然它在国有经济中只占30%，可是，它占的都是重要部门，基础部门、高新技术，都是国有经济。所以，它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改革以来，国有经济的经营状况，效益不好，财务状况都是逐年下降，在当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有许多指标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我这里只想用一个指标，即所有亏损的国有企业的亏损总额占赢利的国有企业的赢利总额的比重。大家看后边的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盈亏状况表。

大家可以看到，开始改革时，这个比重很低，一直到80年代末，这个比重也是微不足道的。从1990年开始，一年比一年高。1990年时已经快占一半。1996年1997年时，已经是赢不抵亏了。1996年1月到4月，1997年1月到3月，整个国有企业是净亏损，今年又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国有企业的效益的状况，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急剧恶化，这一趋势现在也没有被制止。

国有经济的状况不好,就成为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90年代,国有经济的改革就提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有些问题好像与国有经济很远,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国有经济。如农业,中国的农业发展不错,但是,起伏很大,经常是丰收时,卖粮难,歉收时,又买粮难,抢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棉的购销体制,9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的合同收购价提高得非常快,但是,农民的生活改善很慢。这中间有生产方面的原因,从经济制度本身来看,流通的环节严重的薄弱,流通环节就是有一个国有的组织,即国有的粮食部门和“二国有”的供销社。农民对它们的意见很大,今年的改革重点之一就是改革这些购销体制。购销现在是农业不好的重要原因,购销环节就是国有的,或准国有的。再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为什么转移不出来,重要原因就是国有经济的效益下降,不能创造足够的机会让农民就业。所以,农业问题实质上是国有经济下降的问题。

所以,进入90年代后,国有经济的改革就成了重中之重。

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盈亏状况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份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1)	盈利企业盈利总额(2)	(1)/(2)(%)
1986	54.49	744.39	7.3
1987	61.04	848.04	7.2
1988	81.92	973.82	8.4
1989	180.19	923.20	19.5
1990	348.19	736.87	47.3
1991	367.00	769.17	47.7
1992	369.27	904.37	40.8
1993	452.64	1 269.90	35.6
1994	482.59	1 311.60	36.8
1995	639.57	1 305.17	49.0
1996	790.68	1 203.32	65.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二、中国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政策

1956年,中国就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即在“八大”上就提出改革,改革的中心就是国有经济。1958年的改革的基本内容也是改革国有经济。这次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改革国有企业基本方针就是放权让利。从50年代中期,我们对国有企业问题所在的判断,有不准确的地方,认为问题所在是权力过分集中。这个判断不是错的,但是表面的。它集中地表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认为,权和利过分集中到中央,下边没有积极性,所以要放权让利。以前主要是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这次改革开放以后,又包括了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最早是扩大企业自主权,1987年搞承包制,可能是放权让利的最高形式。但是,这种改

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还带来许多副作用。真正的突破，是在 1993 年。这一年 11 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改变过去的放权让利的方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想用一个通俗的语言说明现代公司制度。12 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司法》。1994 年 3 月李鹏总理的报告指出，要按照《公司法》进行试点。1994 年进行准备，1995 年开始试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100 家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准备在 1996 年底验收总结经验，1997 年，全面推广。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理论界，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个试点没有完全按照以前的计划做，即 1996 年试点结束，1997 年推广。当时搞的 100 家试点，包括公司制试点，组建大集团试点和搞股份制公司的试点在 1996 年底进行了检查，发现多数都没有达到现代公司法的要求。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四中全会用了四句话来概括，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在中国的条件下建立大公司有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实际上说明了现代公司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建立法人制度，明确股东的资本构成一个法人资本，这是公司制度的一个财产基础。另外一点，就是公司结构，有许多种翻译的方法，也就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一种制衡关系。第一个要求是基础，关键是第二个。但是，在实现第一点，原来的国有企业的财产制度，如何转变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财产制度，这中间遇到了许多认识上的问题，特别是利益上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做起来，就步履维艰。四句话有两句与它有关，一句是从正面说的，叫产权明确，一句是从反面说的，叫政企分开。以前的所有者是由各级政府，尤其是主管部门代表的，现在要转变到明确谁是股东，占多大的股份。这种转变中有许多认识上的问题和利益上的问题。而且与以前的一些观点和法律规定搅在一起，搞得难解难分。不是一个钟头可以说清楚的。如，公司法还保持着企业法的一些影子。而企业法是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制定的，把原有的法律概念搞混了。如，企业法关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解释，完全搞混了。原来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就有毛病，企业法的解释，则把它们完全变成了所有制的分割。企业的领导人，掌握了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收益权，这都是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公司法中还有这种成份，说股东所有权，经营人员有法人财产权。因为这种混淆，许多干部支持用公司法，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保留他们原来的权力。这样新的公司制就很难实行，1996 年底对一百家试点企业进行检查，发现有 80 多家，是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原来的上级主管机关，搞成了翻牌公司。中国计委搞了一个电力公司，实际就是电力部。领导一会儿以部长出现，一会儿又以经理出现。管理与过去是一样的。当然中央有试点，各地也有试点，结果中国出现了许多股份公司。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股份公司。

另外如何搞现代企业制度，在理解上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开始的时候，以为是所有的企业都要建立公司制。中国有大约 30 万个国有企业，其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大型国有企业只有 6 000 家，中型的是 9 000 家，其余的都是小企业，合 28 万多家。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这种企业，显然不应该建立现代公司。1995 年又提出，公司制只是局限于少数企业，提出抓大放小。还有一种说法，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不要求搞活所有的国有企业，即不一定把所有以前的国有企业都保持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都搞成国有控股公司。越来越多的人赞成这样做。在 1996 年决定要召开 15 大时，各种人都发表意见，首

先提出的是反对国有经济不断下降的观点，出现了几个万言书，其实不止是万言，好几万言。现在有一本书，叫《交锋》，就是讲的这种事。但是，这本书太政治化了。但是，它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有好几个，有的是批判改革，有的批判一个人，基本的命题就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就让国有经济成为唯一的公有制形式。这都是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来的，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在人民大学曾经经过苏联专家的耳提面命，对这都非常熟悉。总之，不论过渡时期有多少种公有制形式，最后，都要变成国有经济。由此出发，改革以来的方向就不对了，因为国有经济的比例一直在减少。他们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复辟有两种一是放小，一是两极分化。

对大的国有企业的改造不是要建立现代公司嘛，对现代公司制我也说明一下。中国大陆在改革开始时，把现代公司制度叫做股份制。因为，你提改成公司制，总要有点根据了，最后在《资本论》中找到了根据，因为《资本论》中第三卷，有一段话曾把公司制翻译成了股份制。1996年的万言书认为，股份制是私有化，放小也是私有化，所以要扭转这一趋势，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抑制其它经济成份的发展，重新恢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改革以来的方向是正确的，国有经济的范围要继续缩小。另外被说成自由化的还有刘吉指导的书《与总书记谈心》，还有一个被万言书批成自由化的是厉有为，再一个就是我。我搞一个课题，今年出了一本书，中心论点就是国有经济要缩小，让多种经济平等地发展，我们的所有法律等都要按照这个来重新审查，修正，也就是说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我们的意见与万言书的意见正好相反。这种争论，在江泽民5月29日的讲话，大体上已经明确了中央的意见。在“十五大”上，这种意见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提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对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人，看政府的文件时，常常看不出什么是新的东西。所以，我这里把新提出来的问题归纳一下，即在江泽民的报告里那些是新的内容。

他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八个项目任务，首要的任务就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核心是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也就是说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不完善，要调整完善，什么叫完善，调整的目标是什么？按照江总书记讲的，就是一句话，“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1]”现在的这种制度显然不完善，要向这方向努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句话，过去也讲过，但是，现在的解释，现在的内容要更准确。在公有制的理解上，在公有制与其它所有制的关系的理解上都有进步。第一，现在的国有经济，还不符合这个目标的要求，要调整，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文件里还有过去的内容，即以国有制为主导，但是，对国有制为主导，做了新的解释。为主导是指，“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主导地位”^[2]。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国有经济要有控制权，不是什么在整个国民经济占多少比例才算是为主导。“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3]。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移入重点领域，当然是从其它领域移入重点领域。这当然意味着国有经济范围的缩小。这一缩小，就有人想起了万言书。代表大会对此做了回答，“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4]”文件里没有说要减少，但是，减少了也不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是对公有经济，提出来要全面

认识公有经济的含义^[5]。什么叫全面，过去理解是很片面的，公有制经济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经济。这种认识不行，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制经济，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6]。文件中提到了这些公有制的形式，在讨论时，提出的公有制很多。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最有希望应该大力支持的公有制形式，是养老基金。“十五大”报告没有提到这些。但是，“十五大”提到的形式，才是公有制，因为“十五大”报告还指出：“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7]第三，讲到私营经济。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在改革初期，为了给发展私营经济找一个理由，在《资本论》中找到一个例子，说雇八个人，如果剥削量没有超过剥削者的个人收入的话，还不能叫剥削者。于是，把非公有制经济分成两种，雇八人以下的，就叫个体经济，雇八人以上的就叫私营经济。现在有时还这么叫，现在有时把它们叫非公有制经济，有的则叫它们为民营经济。这次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一新提法，即“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8]。最近有些争论，人大一个教授批评有人对“十五大”的提法有曲解，认为曲解的人中也包括我。他说过去提非公有制经济是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现在“十五大”报告没有提，是一个发展。他说，这是错误的，“十五大”没有否定过去的结论，仍然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他说，“十五大”报告讲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否定它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我对此不想多说什么，总觉得他讲的挺绕的。总之，“十五大”报告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它经济成分的态度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是发展什么，限制什么，以什么为原则，报告里讲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则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9]。这基本原则已经说到底了。不仅是可以发展，而且应该发展。报告还从法律上讲了这方面的话，如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来保护新的个体。“十五大”后，一个经济学家提出，宪法应该规定一切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有人指责这种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我想指责者大概没有好好学习“十五大”的政治报告。

总之，“十五大”提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改组这一新的要求。

三、“十五大”后“抓大”的进一步措施

1995年，吴邦国就提出抓大，提出抓1000家。经济学界对此反应很热烈，认为它的意义不在于1000家，而在于1001家，即1000家之外的放小。

抓大提出后，有两种抓法。一是惯用的做法，进行企业规模的调整，提出创建大集团，强强联合，建造航空母舰等。一是抓改革，在大企业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让现代公司制度运转起来。但是，相当多的中央部门和政府部门是采取第一种做法。经济学家不赞成第一种做法，因为很早中国就学东德等搞过托拉斯，1978年改革以来，也用各种名义搞联合，成功的很少。因为这样的大企业不是在竞争中形成的，而是用行政命令来凑合成的。在企业